

日本唐代文学研究十家

蒋寅 主编

中唐文学研究论集

〔日〕下定雅弘 著

中华书局

6 日本唐代文学研究十家
蒋寅 主编

中唐文学研究论集

〔日〕下定雅弘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唐文学研究论集/(日)下定雅弘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4. 1

(日本唐代文学研究十家/蒋寅主编)

ISBN 978 - 7 - 101 - 09631 - 6

I. 中… II. 下… III. 中国文学 - 古典文学研究 - 唐代 IV. 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7582 号

书 名 中唐文学研究论集

著 者 [日]下定雅弘

主 编 蒋 寅

丛 书 名 日本唐代文学研究十家

责任编辑 孙文颖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 $\frac{5}{8}$ 插页 2 字数 160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9631 - 6

定 价 29.00 元

前言

蒋 寅

这套丛书是十位日本学者唐代文学研究论著的荟萃,约略反映了日本学界中年一辈专家研究唐代诗文的重要成果。

三年前,我与同事张剑兄一起翻译川合康三教授的《终南山的变容》一书,常就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进行一些交谈。正值王水照先生主编的《日本宋学六人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我收到老友高津孝和浅见洋二教授的赠书,欣忭之余又不免有点遗憾,觉得日本研究唐代文学的学者更多,成果也更密集,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介绍给国内学界。张剑兄是个有心人,马上同学苑出版社郭强先生商谈,决定推出一套日本学者的唐代文学研究论著丛刊,嘱我组织稿子。这当然是个好事,我欣然从命,马上邀约我熟悉的学者,并请川合先生等资深教授参酌推荐,最后商定请松本肇教授等十位学者各自遴选自己的论文,编为一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一套日本学者唐代文学研究丛书。

这一倡议承蒙诸位先生慷慨应允,翻译、編集工作很快就开始进行。正当我热切期待各位作者的书稿时,一个不幸的消息突然传来,郭强先生因病猝逝!我与郭强先生素昧平生,自项目开始以来,尚未谋面。乍闻噩耗,惊悼不已,更为他的英年早逝不胜惋惜。

学苑出版社在郭强先生的努力下,历年出版不少古典文学研究论著,对当今学术的发展卓有贡献。他的去世,无论对出版社对学界都是个很大的损失。他的工作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因郭强先生离去,我不得不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另外寻找出版社。幸而得到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先生和汉学编辑室主任李晨光先生的支持,决定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套丛书,这让我和各位作者深感欣慰。

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界,是我酝酿已久的夙愿。从三十年前开始研究唐诗,阅读松浦友久教授的《詩語の諸相》,我就不断受到日本学者论著的启发,萌生翻译、介绍日本唐诗研究成果的愿望。1984年初我翻译了松浦教授的《中国诗的性格》一文,发表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1辑,从此一发不可收,陆续翻译了三十篇日本学者的论文,除了几篇友人邀约的译稿,多数是自己研究所需的参考文献。阅读日本学者的论文,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了解海外汉学成果对于我们研究的必要。同事刘跃进研究员多年来曾反复提到古典文学界“补课”的话题,其中亟需补的一门课,就是海外汉学。中国古典文学早已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海外每年都有不同语种的研究著作出版,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问题。不了解这些成果,我们不仅会错过许多有益的启发、有价值的参考,甚至还可能出现课题撞车、重复劳作的结果。补海外汉学这门课,的确是刻不容缓的。

但要补海外汉学的课,又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许多国家、许多语种的研究著作,要去调查、介绍、翻译,这对我们的外语能力、经费和时间精力都是很大的挑战。近年,海外汉学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出版了一些专业刊物和研究著作。但我们对海外汉学的关注,整体布局还很不均匀,对日本、美国和西欧关注较多,对俄国(苏联)、东欧、北美和其他地区则了解较少。西欧也只是英、德、

法、荷几国了解得多一点,其他国家我们还不太清楚有什么学者做出了什么成果。这种情形与当今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不相适应的,亟需改变。

就当今海外汉学的格局而言,日本汉学历来最受国内学界的关注。这不仅因为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交流便利,更主要的是日本学者的成果扎实细致,广受各国研究者的重视。欧美学者凡治汉学的,首先必学日语,阅读日本学者的论著。我接触到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欧美学者,基本都懂日语,能看日语文献。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更不能不了解日本同行的工作。

日本在古代曾是中国文化的热心学习者、研究者,从奈良时代的遣唐使和留学生开始,日本的僧侣、留学生乃至商人来华,无不搜购大量的汉籍舶载回国,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近代以来,中国国势衰弱,社会动荡,大量公私藏书流散市肆,日本汉学家来华游学,悉留意搜罗,满载而去。著名藏书家的藏书也成为日本财阀渔猎的目标,陆心源皕宋楼和董康诵芬室的藏书就分别被岩崎和大仓两家财团购去。丰富的汉籍收藏,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典籍和古典文学提供了良好的文献条件,也保证了其研究课题的专门性和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当然,日本学者的研究更值得我们尊重的还是其专业精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我们常不免将日本汉学成果视为可资借鉴的利器,但许多日本学者,尤其是老一辈的汉学家,他们都是像欧洲学者研究希腊、罗马文化那样,怀着一种亲切的眷恋来研究中国文化的。这使他们对中国的文化研究,历来都投入最大的热情(也许只有明治以后的一段时期是个例外),他们对学问的虔诚和好学的天性,更足以保证其工作及业绩的高水准。西方汉学家素来重视日本学者的成果,不是没有道理的。当今新一代汉学家,虽然较老辈的治学立场已有所不同,更多地是将中国文学当作外

国文学来看待,但仍继承了日本传统汉学的专业精神,相比欧美汉学来,其学术特点是非常鲜明的。

与欧美那些疆域广袤的国家相比,日本国土狭窄,资源不足,近代以来一直以技术为立国之本,对新知识的反应和吸取极其敏捷。日本对外国的研究和了解,也明显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在日语里,信息一词的汉字写作“情报”,让人联想到军事和战争。日本学者做研究,确实就像是进行战争一般认真和精准,对与研究对象有关的任何信息都搜集得很完备。日本可能也是世界上翻译外国书籍最快、最多的国家,这使得日本学者总是能方便地掌握世界各国的学术动态,在较开放的视野下开展工作。而视野广阔,对别人的工作了解得清楚,就势必会限制自己的工作范围。就好像纪晓岚,学问有名的广博,同时人都奇怪他不著书,他说自己编四库全书,发现自己要说的前人都已说过了。事情就是这样,学问越深广,可能研究的课题就越细密,钱锺书先生便是个最好的例子。

我常感到,中国学者对日本汉学的议论往往流露出一种偏见,认为日本学者的论文选题狭小,行文短订,注重资料荟集而疏于思理分析。这显然是对日本汉学了解太少的缘故。研究课题的具体和细化,是学术成熟和深入的标志。日本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虽不如我们多,但他们的著作因为用功专精和细致,常达到令人佩服的深度。尤其是国内学术研究中断的二十年间,他们孜孜不懈的工作积累了许多重要成果。即便是这套丛书的作者,许多论文也是在七八十年代发表的,那时国内的研究还处于复苏、起步的阶段,而他们所探讨的问题却已相当深入,可以说领先于中国学者许多年。我在《日本学者中国诗学论集》的前言里,曾提到过自己当时感觉到的国内中唐诗研究方面与日本的差距,以及从日本学者的论文中得到的启发,相信这套丛书仍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唐代文学在中国,因为受到传统评价的影响,一向只有盛唐诗独领风骚,中唐相对来说不太为人重视。直到 80 年代以后,历史取向替代形而上学取向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主潮,中唐文学研究才逐渐受到关注,蓬勃兴旺起来。而日本则不同,由于大诗人白居易与平安朝文学的特殊关系,以白居易为中心的中唐文学研究,一直就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占有醒目的位置。1990 年,由川合康三、松本肇等学者发起的“中唐文学会”成立,不仅团结了研究中唐文学的中青年学者,更改变了日本学术纵向延伸的学术传统,将一种与信息社会的特性相契合的学术运作方式带入了日本学术圈。这套丛书的作者大都是中唐文学会的成员,但他们的成果绝不只限于中唐文学研究,而且他们的学术风格和研究方法也是多样化的。

其中既有芳村弘道教授传统的文献学研究,也有深泽一幸、松原朗教授那种富有创意的新颖探索;既有松本肇、赤井益久教授的宏大议论,也有下定雅弘、斋藤茂教授的精微辨析,还有户崎哲彦教授那样的现地考察。这些论著,无论其选题立论之旨如何,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言之有物,论不虚发,绝无人云亦云、了无新意的论说。这是严肃的学术精神加严格的学术训练的结果,也是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准的保证。有一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学者的有些研究相当地生活化,与自己的生活情趣紧密结合。比如丸山茂教授研究白居易的日常生活与饮食习惯,就是中国学者较少注意的。另外,日本学者明显对自然名物感兴趣,这也许和他们中小学充分的自然知识教育有关。孔子论学《诗》的意义,不就有一条“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么?看看市川桃子教授对唐诗中花草果木的研究,就会感觉古典文学研究其实可以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距离很近,但我们经常都忽略了这一点。

说起来,这十位作者都是我熟悉的朋友,除了松本肇教授去年已荣休,其他九位都是各大学的中坚教授、活跃于当今学界的中年

专家。多年来,阅读他们的论文成为我很好的学习机会,由熟悉他们的研究,进而了解了日本的学术。我很高兴有此机会,促成他们的论著在国内以中文出版。在此我要向各位作者和译者表示感谢,同时向中华书局和为这套丛书的出版付出努力的李晨光先生、孙文颖女士致以崇高的敬意。我相信我们都做了一件值得做的事。

2011 年 1 月 10 日

序

周建国

中国传统文化灿烂悠久,唐代文学无疑是最辉煌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辉煌的盛唐以后,中唐文学又掀起了一个高潮。此时除诗歌外,古文、传奇、曲子词都充满活力,流派纷呈,大家竞出。引领新乐府运动的白居易、元稹,倡导古文运动的韩愈、柳宗元,以及在诗歌、古文、词曲诸方面独树一帜的刘禹锡都是中唐时代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所创造的诗文作品不仅深深影响我国历代的广大读者,而且产生了广泛的世界性影响。日本冈山大学下定雅弘教授的《中唐文学研究论集》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列入日本学者的汉语论文集出版计划将在中国出版,这既是对作者潜心研究的肯定,同时也说明唐代先贤泽披海外,至今影响深远。在当前中外文化频繁交流的趋势中,事实多么雄辩地证明着在世界范围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仍在时时显示出它的现代意义。

中唐文学研究是现代日本唐学研究的一个重点。1990年10月,由日本中青年学者组成的“中唐文学研究会”在东京成立,并举行了首届讨论会。日本大阪大学的斋藤茂先生在《“中唐文学研究会”在日本成立》的通讯中说:“中唐是中国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人们一般认为它是从盛唐到宋代的一个过渡时期。不仅如

此,同时它又是一个变革时期——即具有强大动能,快速旋转的时期以及破坏和创造、混沌和秩序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所以我们应该从新的角度,用新的方法研究这个时代。”(《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1年)现在展现于我们面前的下定雅弘教授的中唐文学研究成果十分具体地说明日本学者在中唐文学研究方面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我想《中唐文学研究论集》只是日本同行丰硕成果中突出的一项吧。

本书选取中唐大家白居易、元稹、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作为研究对象,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作者个体的特殊性研究和知人论世的群体性研究,都有可称道处。而下定雅弘教授的白居易研究在国际唐学界原是受人关注的,他从1993年起即为太田次男教授主编的七卷本《白居易研究讲座》系列丛书的编委,从2000年开始又参与编辑每年一本的《白居易研究年报》。日本同行们深厚扎实的文献功底和新视角、新方法的研究给中国读者以深刻印象,下定雅弘教授所贡献的成果显示出作者不愧为唐学研究的佼佼者。

《读〈白氏文集〉札记》是本书的核心论文。作者就白氏任翰林学士及守母丧期间的制诏及拟制、元和十年为界的诗变及其“独善”观念、白氏制造的新体与旧体等问题提出不少富有创意的见解,启人深思。其对于中日学界前辈学人既十分尊敬,又不盲从。这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尤其可贵。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是国际唐学的名著,但其中亦不免有疏误失考之处。作者指出:“关于白居易中书制诰的‘旧体’与‘新体’之分,中国陈寅恪、日本铃木虎雄两位硕学认为‘旧体’是骈体,‘新体’是散体。……笔者调查了中书制诰全文使用对偶的比例及四字句率,得出的结论:‘旧体’是古体,‘新体’是骈体。”他注意到日本的平冈武夫先生在《白氏文集》第二册(1972)、中国的孙昌武先生在《唐代

古文运动通论》(1984)、王运熙先生在《白居易诗论的全面考察》(1992)中提出了与陈寅恪、铃木虎雄相反的看法,但学界对这一重要问题却没有引起讨论。作为精于文体的中年学者,下定雅弘教授多年潜心于诗体文体的研究,他又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用电脑建立资料库,精确统计出旧体和新体制诰的对偶率与四字句率,有力地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在前贤研究基础上的进步是值得同行们学习的。

《读〈白氏文集〉札记》第二章专门论述了翰林制诏的拟制。白居易的翰林制诏数量居唐代翰林学士第一,他的拟制作品也很多,这在中唐翰林学士中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拟制是虚拟的作品,与身为翰林学士正式受命起草的制诏不同。其中夹杂真伪,要理清拟制中的真伪,难度极大。这情况曾被唐学大师岑仲勉先生关注,其《白氏长庆集伪文》(1947)断定白居易的翰林制诏中,那波本卷三十七、三十八的作品大都是伪文。此说影响很大,中国学者大多沿袭岑说。但日本学者则以为诸旧本总目与卷题明确表示“拟制”,虽然与作者的官称往往不符,但仍应是白居易的作品。下定雅弘教授是这样解释的:“他可能是为了将拟制与真正的制诏明白地加以区别,故意写记这些虚衔。”如果再从白居易当时参与政治的方式与心态言,丁忧以后,他虽然退居下邳,儒家济世的热情仍丝毫未减。拟制让他又回到了皇帝近待的世界似的,或许他正在为服阙后大展宏图作准备。不改积极参政之心,这就是拟制产生的背景。作者解释说:“拟制正是在下邳服丧不失谏官的自尊心与使命感的白居易‘直’的思想表现。他借拟制的虚构表现了自己对王朝体制、官人的理想。”这些意见不仅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且知人论世,启人深思。但是,这两卷作品是否全是拟制,其中是否杂有伪作?还可进一步探讨。是否可以进一步考察白氏前后

的翰林学士们所撰拟的制诏,由个别到一般作群体考察?这样的问题,岑仲勉先生在文章中亦考虑过。他说:“或者曰,子何不观乎东本之总目,其第三十七、三十八两卷不尝有‘拟制附’三字注其下乎?又不观乎马本卷五四之卷首,非亦注‘拟制附’三字乎?”他还参照刘禹锡《拟太子太保》、《太子太傅等制》,以为刘、白情况不同。理由是“一制之迁贬也,命出主上,草自翰林,受者僚友,拟之而善,无所讨好,拟之而不善,则上得罪于君,下得罪于友。禹锡之拟制,全是空空洞洞,并无主名,以白之明,岂肯出此。”这样从正反两方面思考问题,可能会更客观一些。我想读者在阅读本书驳诘岑氏论点的同时,同样会希望作者考虑岑氏论述的合理方面以完善自己的论证。岑氏指出的两卷“伪文”中是否有出于“盗名求售”或“牛党之余孽所为”者,也是可以进一步思考探讨的。应该说由特殊到一般的群体性研究是本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作者对汉魏六朝的五言古诗下过功夫,曾对曹植、王粲、阮瑀等建安诗人作过专门研究。因此,作者对诗体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本书《白诗的转折——从江洲时代到杭州时代》,《论柳宗元诗的诗体——兼论元和十年自古体到近体变化的原因》都能见出作者的独到之见。以前的文学史说到白居易和元稹往往会提及他们的新乐府运动及诗歌创作,但他们在长庆时倡导制诰文体的改革,显然受到韩柳古文运动的影响。白诗《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云:“制从长庆辞高古。”句下自注:“微之长庆初知制诰,文格高古,始变俗体,继者效之也。”这样重要的文学创作在文学史里却被忽视了。至于韩愈和柳宗元,他们以古文运动的业绩著称,但韩柳后来的诗作却由古体向近体转变。作者认为诗体的改变和人的精神有联系,从时代背景而言,“‘元和中兴’的此时代是唐朝直面危机的时代,同时是官人们面对危机昂扬使命

感的时代。其使命感的昂扬在诗文的世界中的表现就是以元白的新乐府运动与韩柳的古文运动为中心的复古的高潮”。“白居易与柳宗元诗体改变的外因是元和十年前后长安官场压迫批判者的政治态度。反而言之,他们的诗体变化表明使命感昂扬的时代快要结束了”。作者选择有代表性的白居易、柳宗元作深入探讨的个案,进而探索白居易、元稹、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诸位大家在相同的中唐政治环境和文化背景下出现的创作变化,这样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作者的群体研究就有了可信度和高度。这种带有规律性的探讨是非常可贵的,它大大超越了寻常见惯的作家作品研究而显示了一种宏通的眼光和理论的深度,启发读者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作深入细心的探究。当然文史研究的规律性探讨又不同于理科的定理发现。诚如作者在《研究外国文化,如何打好自己的学问基础》一文中所说的,社科院有些专家在听了作者关于柳诗的报告后提出一些不同意见,确实诗体和作者的精神联系在复杂的文学世界里不可能简单相似。古体近体诗与作者的精神状态的联系在盛唐李杜与晚唐小李杜那儿可能是不同的情况。文学发展有其自身的独特规律,千变万化,难能一以贯之地去把握,读者也只能根据不同情况切实分析,取其精义而已。如作者对白居易的“独善”观念有很深刻的论述,但当我们分析柳宗元的“独善”观念时,发现其与白氏的观念内涵基本不同。这就是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必须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去解读,然后归纳综合。

顾炎武《与人书》曰:“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学研究如果专注于吟风月,弄花草,对文学概念之探索只作雕虫篆刻般的解说,无视历史传统人文精神,那就正如顾炎武所批评的那样了。下定雅弘教授选取的是中唐文学大家,像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在中国思想史上还占有重要地位。他在阐释白氏的“独善”时,始终抓住白

氏所具有的“兼济”的儒家民本思想。这些文学大家不管其仕途的穷达、遇与不遇,都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其源皆出于儒家“民为邦本”的优秀传统。因之,作者的研究在当今世界仍具有积极的现代意义,这是值得赞扬的。本人特向读者郑重推荐这本富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古代文学论著。

目 录

序	周建国 1
---------	-------

白居易篇一

读《白氏文集》札记	3
前编 《长庆集》的世界	11
第一章 新乐府五十章	
——兼论其成立时期	12
第二章 试论翰林制诏的拟制	20
第三章 白居易的闲适诗	
——兼论其主要观念成分的变化	26
第四章 感伤诗	28
第五章 白居易在江州	
——对庐山的爱情与告别	30
第六章 如何读《与元九书》	
——兼论四分类的成立	32
第七章 中书制诰	
——兼论其旧体与新体之区别	34
中编 自《长庆集》到《后集》以后	38

第一章 白诗的转折	
——从江州时代到杭州时代	39
第二章 白居易的“独善”(上)	
——兼论闲居快乐的理论依据的形成	42
第三章 白居易的“独善”(下)	
——“独善”以外有关闲居的快乐的观念	45
后编 《后集》以后的世界	48
第一章 格诗	49
第二章 律诗	50
第三章 白居易一直到晚年仍愿意当宰相	51
第四章 白诗之老庄思想与佛教思想	
——兼论从《长庆集》到《后集》以后的变化	54
第五章 白居易散文中的老庄思想与佛教思想	
——兼论从《长庆集》到《后集》以后的变化	56
第六章 如何了解白居易一生中的思想变化?	
——兼论两唐书的白居易形像	60

白居易篇二

第一章 白居易的斋戒	63
第二章 从白居易的咏“裘”诗看其“共生思想”	
——兼论白居易“独善”的深层内涵	71
第三章 战后中日两国白居易研究的趋向	
——兼论时代思潮与研究观点的关系	80
第四章 近二十年日本白居易研究概况	85